

● 圆桌会议

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 跨文化对话

——清华—哈佛后殖民理论高级论坛述评

王 宁

清华—哈佛后殖民理论高级论坛于6月25日和2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出席此次论坛的有来自亚洲、欧洲、澳洲和北美一些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论坛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后现代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我本人作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持了论坛，并作大会发言。论坛特邀美国哈佛大学安·F·罗森伯格英美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兼该校历史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霍米·巴巴(Homi Bhabha)作主题发言。此外，巴巴还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公开演讲，题为《全球性的尺度》(*A Global Measure*)，内容基于他本人即将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同名专著。

巴巴的主题发言着重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少数族裔批评话语的建构问题，巴巴认为，虽然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都在谈论全球化问题，但他们似乎都忽视了另一个颇有生机和潜能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少数族裔群体的问题，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少数人群体。他们的批评话语始终有着自己的独特传统。这一传统完全可以在美国已故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的著作中见出端倪。巴巴通过细读杜波依斯的政治小说《黑公主》阐述了自己的后殖民理论和文化认同观念。接着，他在回顾并评述了葛兰西、巴里巴、赛义德、查特基、詹姆逊等人的批评理论后，提出了一

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计划,这就是所谓的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计划,这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它并非要取消历史,而是要担当起连接对过去的记忆和对当下的认识之桥梁作用。下面是巴巴发言的要点。

巴巴从分析杜波依斯小说《黑公主》入手,指出,一种为民主而实施的审美教育恰是杜波依斯的“富有才能的十分之一”之理论的基础,这种审美教育的热情和积极的精神来源于坚韧不拔的艺术与道德。作为受到种族歧视的少数族群体的一员,杜波依斯揭示了“他后来所谓的‘特别的道德曲解’,它坚持民主,这种民主拒绝面对‘多数族群体的问题’。少数族被逼出民族之外,被剥夺了完全的公民资格;但他们却发觉了一种可能性:在民族内部创立‘部分性群体’,以此作为一种审美与道德公正的对策。与带着热切想像力的道德的少数族群体一起,杜波依斯站在民族社会的边缘,既与黑人世界相毗邻,又接近白人的世界,朝着一种‘民族间的’或准殖民地的方向发送具有双重目的的信息。

异族的家庭关系被当作隔离的原因,这样的事情已司空见惯,黑人士兵受到区别对待,被迫脱离“爱国的”民族,其根据是黑人士兵的“非洲血统”可能会使他们成为德国军队的盟友。但是这种种族主义的想像不仅误解了少数族,而且揭示了公开声明的现代民族的多元性和宽容性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因为正如我们近来所看到的,这个想像的群体非常容易受到偏执的和迫害性的独立政策这一逆流的侵害,这一逆流将他们的偏执妄想和暴力转向“内敌”——常常是少数族群体——并且加之以种族歧视的标识。杜波依斯深刻地地质疑多数人共谋的、不民主的捏造,藉此重新展示了这种误解少数族——“这个美国世界里具有远见卓识”的臣民——的害处。

黑人群体被强行排挤出民族的文化共识和同时代性的意识之外,这就促使杜波依斯将少数族这一概念另外阐发为一个富有权柄的“部分性群体”:“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小群体所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它也许比较容易成为表达人类意志、解放人类灵魂的最有效的方法。”一个少数族群体决不仅仅是政治“存在”的数字形式;变

成少数人是一种诗意的行为,是“做”或者制的一种模式,是一种临时的联盟或应急的政治团体,它通过利用隔离这一不利因素,创立起共同的事业,目的是为了恢复一种对文化力量的策略,恢复一种心怀敬意的认识。

如果我们仅仅推崇《黑公主》的解放性信息,将其看成是非洲裔美国籍的遭受种族歧视者杜波依斯与反帝的印度公主的崇高的合成,那我们就遮蔽了杜波依斯在小说中所探索的乖张偏执、很成问题的政治热情。1911年世界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向与会者呼吁东方和黑人的共同的重新觉醒。杜波依斯欢迎这次大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代表了他对种族隔离的理解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在《黑公主》的内部深处,杜波依斯以一种与历史先例和模仿模式之精神截然不同的方式,富于挑战性地提出了“种族歧视中的种族歧视,偏见之内的偏见”的观点,作为政治表述和叙述进步的问题。

借助种族歧视中的这一抹阴影,杜波依斯将一种女性化了的亚洲式的“古风”引入了叙事的语言上和视觉上的表演舞台,这种文化差异的风格非常感性地表现在黑公主身上。通过她的东方式的情感,她象征着一种政治热情和领袖魅力,这使得她与她进步的、准物质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见解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裂痕。一方面,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贵族政治、皇族血统和印度的种姓制度,而另一方面,她又对毕加索、普鲁斯特——甚至马克思——都有着浓厚的“高度现代主义”的兴趣。这种颇具影响的裂痕将她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服务于世界和跨民族解放的偶像。她将古旧和先锋集于一身。本来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或“阶级”的矛盾、一种对寡头政治的屈服的东面,在这里却被“并置原则”转化为聪明机智的政治信息。

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歧视要求本土人民“证明他们的人性”,方法是通过采用“西方化”的规范。它假定你愿意成为白人或被白人化或“现代化”,而这种意愿只能被部分地或有选择地得到许可,于是你自身的区别被“标准化”了,你的欲望被归化成了多数人的主张。另一方面,英国的殖民势力精于“分而制之、各个击

破”的策略,通过不断地制造“种族歧视之内的种族歧视的阴影”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民族分割开来。反殖民主义的少数民族的策略向殖民主义体制提出了挑战,这种策略是“重新划分”帝国主义强行分割的种族歧视的范围,将其分成外部领域(物质的机构)和内部领域(文化的认同)。通过将内部领域/外部领域的区分模式印刻到歧视性霸权的主要帝国主义话语内部的、殖民主义的自我/他者的二元模式上,反殖民主义策略逆转了帝国主义霸权,或者创立了一种“不恰当的”反殖民的模拟。在物质领域内西化的影响越大,在精神和文化的飞地之中的抵制就越激烈。这种亚洲/非洲式的“双重意识”的要弄人的矛盾及其“双重目的”胜过了殖民者区别对待的政治隔离和文化二元论——前现代/现代,独裁/民主——其方法是在西化和本土化、跨民族的和民族的、现代和乡土(而不是古旧的和前现代的)之间进行大量的关联。

与杜波依斯所谓的“并置结构”保持一致,作为反殖民策略——推翻殖民主义者的种族歧视、照搬物质领域而在文化领域则认清自身——的双重模拟,允许受到种族歧视的人去设想一个文化“差异”的同时代,去争取一种区别之中有平等的权利。

杜波依斯的核心洞见在于强调少数族形成的“接合的”和偶然的性质;在这里,是否能够团结一致要有赖于超越自主性和主权,而赞同一种跨文化的差异的表达。这是一个有关少数族的富有生意的、辩证的概念,它是一个亲善契合的过程,是正在进行的目的和兴趣的转化;通过这种转化,社会群体和政治团体开始将它们的信息播向临近的公众领域。少数族化(minoritization)实际上是另一种全球化,这一理性概念远比少数族的人类学概念优越。

巴巴的这些颇有洞见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不时地引发一个接一个问题。

确实,诚如一些国内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是继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讨论之后西方学术理论界又一股有着强劲冲击力的理论思潮,它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有着强有力的挑战性和批判性,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殖民主义和

文化霸权的斗争密切相关。在当今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霍米·巴巴是与爱德华·赛义德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齐名、并有着更大潜力的具有代表性和独特著述风格的大师级学者。他早年在牛津大学求学并获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现任哈佛大学安·F·罗森伯格英美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和该校历史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作为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巴巴的著述包括《民族和叙述》(*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等。其论文散见于各主要英美理论期刊,有着极高的引用率和转载率。他的新著《全球的尺度》(*A Global Measure*)和另一本专题演讲文集将分别于近期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巴巴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作为中国学者,我在发言中着重讨论了当前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界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文化身份问题,这也是巴巴建树颇多的一个领域。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在中文的语境下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近十多年来,身份政治已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里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学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于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而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显然,不管将文化身份视为特征或一种认同建构,都说明了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研究文化身份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因而便出现了从一种身份裂变为多重身份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印证出巴巴所阐述

的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特征。因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旅行和传播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等媒介来实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即使有着鲜明的民族身份,也很难说他的文化身份就一定和他的民族身份一样明显,特别是从事西方文学研究的学者,恐怕更是两种文化交织一体的代表。

当然,研究文化身份问题必然也涉及流浪文学、性别政治、文化翻译和后殖民的主题,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全球性的后殖民语境下,认同政治或身份问题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接着,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殖民性”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传统的文化来说,它不可能不打上被殖民的印记,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强大的防御机制,因此认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被殖民的说法显然是偏颇的。诚然,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身份时,使之变得不确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规模对西学的翻译。在这方面,鲁迅的贡献最大,林纾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林纾当年的翻译,并非要从语言的层面上对他的一些误译吹毛求疵,而更主要地却是要着眼于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尽管林纾本人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而且在翻译时所依赖的口译者也未必可靠,但他常常将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对原著的有意误读之基础上,这样实际上就达到了用翻译来服务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之目的。因此,他在译出的文本中所作的有意的修改和忠实的表达常常同时存在于他的译文中,实际上起到了对原文形象的变异作用。但正是这种带有变异特征的改写和译述却构成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翻译文学文体。五四时期的不少作家与其说在文体上受到外国文学影响颇深,倒不如说他们更直接地是受到了(林译)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从当今的文学经典重构理论来看,林纾的翻译至少触及了这样一些问题:翻译文学究竟与本国的文学呈何种关系?翻译对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究竟能起何种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在使得中国文化“被殖民”的同时,林纾的翻译是否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认同问题?我们今天从文化

身份的角度来考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林纾为代表的翻译文学本身也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因为它使得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得以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来考察,从而在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非殖民化”和“去中心化”。这实际上也是翻译的双重作用和不确定的“身份”或认同:它一方面向原文认同,为了忠实而不得不臣服于原文,但另一方面它又得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语言认同,使得译文能够被本民族的读者所接受和理解。

同样,考察一个处于全球化语境之下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或认同问题也可这样。置身于后殖民理论批评的不少西方学者都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斯皮瓦克至今仍宁愿用申请美国签证的方式来维持在美国的居留权,巴巴则同时持有英国护照和美国绿卡。但这两位出生在印度、从小受到东方文化熏陶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常常遇到这种民族文化身份“不确定性”的责难。就巴巴的情况而言,他虽然现在身居第一世界学术的中心,但是他所出生在其中的印度民族的文化印记却难以在他身上抹去,他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先是英国现在又是美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他身上印证出文化“混杂性”(hybridity)的特征。

参加论坛并作演讲的另几位学者包括廖炳惠(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杰瑞米·坦布林(Jeremy Tambling,英国学者,现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和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和东亚语言文学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他们分别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以及旅美华人中研究后殖民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他们与巴巴教授的对话使得中国的后殖民文化研究迅速进入了国际前沿。巴巴对此次直接对话的效果感到满意,他认为,此次论坛在北京的举行为下次在哈佛举行类似的对话和讨论奠定了基础。

廖炳惠是中国港台地区最早介绍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少数能够直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台湾学者之一。他的发言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出发，讨论了台湾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后殖民倾向，着重描述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是如何在台湾的中文语境下受到接受和误读的。由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对帝国霸权的批判性和解构性，因此它同时被“统一派”和“台独派”用来作为自己的武器，但是这种误读无疑已经与后殖民理论家的初衷有了较大的距离，它所导致的后果也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他的发言对与会的大陆学者了解台湾近年来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之现状颇有启发意义。

来自香港大学的英国学者坦布林也以自己独特的双重身份介入了后殖民理论讨论。他的出发点和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偏执性(paranoia)，这也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德勒兹等人始终关注的一个话题。他在指出存在着一种全球性的一神教的同时，批判了后殖民主义的偏执性。他认为，关于后殖民的论题同时也是关于全球化的论题，尽管前者并不可能被还原为全球化，这是因为后殖民主义所主张的是一种对强权的抵制，而包容一切的全球化则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强权，理应受到前者的解构和批判。当前对全球化抵制的一个独特形式就是9.11事件之后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认同，这是一种危险的一神教倾向。坦布林在发言中通过对一些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等的解读，批判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偏执狂修辞和理论话语。

张旭东是近几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崛起的一位华人青年学者，尤其在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领域内著述颇多，并有着一定的影响。他在发言中首先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产生于印度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去殖民化”和重写民族历史的努力；同时，它又是随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入西方大学体制，在英美的学术空间和社会政治空间内部形成的理论话语。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后殖民主义在其他语境(包括当代中国语境)的相关性和适用性需要我们加以历史的、批判的界定。他反对对后殖民主义做简单的否定，强调该理

论话语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殖民地经验，而是在于对“现代性”观念体系内在的欧洲中心论进行深入的批判。他同意查克拉巴尔蒂(Dipesh Chakrabarty)在其新著《将欧洲外省化》中阐述的观点：欧洲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往往对非西方世界缺乏经验和实证的了解，但他们的思考仍然对非西方知识分子具有理论上的启发意义甚至行动上的指导意义。而非西方知识分子却无法在对西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有效地思考本民族的问题。他认为，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指向不是这种知识和文化生产的不平等，而是引导人们去思考它所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由此着眼，问题并不在于非西方知识分子无法独立于现代西方思想体系思考，而在于西方自身特殊的价值观和政治自我意识把“现代”等同于“西方”，从而把近代西方的独特的自我认识作为“普遍真理”和“世界历史规律”强加给非西方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成为唯一的主权形态和唯一的理论来源；而“一切其他社会历史形态都成为西方历史的主题变奏”。他借用日本学者竹内好对中、日现代性的批判比较研究，指出，真正的“去殖民化”努力在于非西方知识分子在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自我批判，因为“欧洲中心论”往往在“后现代性”，在“现代化”和“西化”的边缘，通过民族国家及其精英阶层对欧美现代性的简单复制而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主体性重建不可能摆脱对自身现代化进程的批判反思，也不可能独立于“西学”及其内含的历史性问题。这要求我们回到中国现代性观念的源头活水。

毫无疑问，此次高级论坛在北京的举行，有着深远的意义。虽然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语境下引起了人文学者们的强烈兴趣，但是真正达到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却始自本次论坛。我们通过和巴巴等一批有着第三世界民族文化背景的西方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不禁对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现状感到不安：虽然“失语”的现象正在逐步克服，但毕竟，中国学者和批评家在国际性理论争鸣中发出的声音是十分微弱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何在？恐怕这并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有责任为之作出持久不懈的努力。